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天工开物 译注

[明] 宋应星 著

潘吉星 译注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iangong Kaiwu

or Exploitation of Products from the Nature by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Skills and
Natural Power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天工开物 译注

[明] 宋应星 著

潘吉星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iangong Kaiwu

or Exploitation of Products from the Nature by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Skills and Natural Pow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工开物译注/(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ISBN 978-7-5325-4768-5

I. 天... II. ①宋...②潘... III. ①农业史—中国—古代
②手工业史—中国—古代③天工开物—译文④天工开物—
注释 IV. N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5097 号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韩寓群 徐传武 主编

天工开物译注

[明]宋应星 著

潘吉星 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25 插页 5 字数 280,000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4768-5

N·1 定价: 36.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素称发达，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凯恩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世界科技史后指出，在明代中叶以前，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在秦汉时期编写的《周髀算经》比西方早五百年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东汉的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比欧洲早一千七百年；南朝的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果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擅长发现和发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抱着“普及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研究和继承科技方面的民族优秀文化，以鼓舞和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增进群众文化素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宗旨，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当时，特邀老出版家、科学史学者胡道静先生（1913—2003）为主编。在胡老的指导下，展开了选书和组稿等工作。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得到许多优秀学者的支持，纷纷担纲撰写。出版后，也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套丛书在上个世纪仅出版了五种，就不得不暂停。此后胡老故去，丛书的后继出版工作更是困难重重。为了重新启动这项工程，我社同山东大学合作，并得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请韩寓群先生、徐传武先生任主编，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选定书目，重新修订编撰体例，重新约请作者，继续把这项工程尽善尽美地完成。

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并考虑到现在读者的阅读要求与十余年前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对该丛书体例作了如下修改：

一、继承和保持原体例的特点，重点放在古代科技的专有术语、名词、概念、命题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要求作者运用现代科学的原理来解释我国古代的科技理论，尽可能达到反映学术界的现有水平，从而展示出我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所存在的不足。为了达到这个新的要求，对于已出版的五种著作，此次重版也全部修订，改正了有关的注释。希望读者谅解的是，整理古代科技典籍在我国学术界还是一个较年轻、较薄弱的一门学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中的许多经验性的记载，若要用现代科学原理来彻底解释清楚，目前还有许多困难，只能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而逐步完成。

二、鉴于今天的读者已不满足于看今译，而要阅读原文，因此新版把译文、注释和原文排列在一起，而不像旧版那样把原文仅作为附录。

三、为了方便外国友人了解古老的中国文化，我们将书名全部采用中英文对照。

四、版面重新设计，插图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重新制作，从而以新的面貌，让读者能愉快地阅读。

五、对原来的选目作了适当的调整，并增加了新的著作。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的重新启动，得到了许多老作者的支持，特别是潘吉星先生，不仅提出修订体例、提供选题、推荐作者等建议，还慨然应允承担此套丛书的英文书名的审核。另外，本书在人力和财力上都得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山东大学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支持这项文化工程的单位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希望热爱“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的老读者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也期望能得到更多的新读者的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导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包括《天工开物》译注及原文两部分。前者将该书译成现代汉语并加注释，后者对原著加以校勘、标点。为使全书结构更为严密，我们对各章次序及有关节的位置作了技术上的调整，文字仍不变动。《天工开物》原著是三百五十多年前明代科学家宋应星（1587—约1666）写的一部优秀的插图本科技著作。当读者读到此书时，会对其中内容及插图感到格外亲切与熟悉，因为不久前人们还在南北城乡看到大体类似的生产情景。虽然因科技的进步，大部分工农业生产已用科学手段和机械进行，但手工生产仍作为辅助手段在一些地区继续存在，这在外国也是如此。我们相信这部书至今还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一、《天工开物》的成书、内容及其体例

此书出现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1637），即明代末期。当时欧洲处于后文艺复兴时代，封建制走向崩溃，资本主义正在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科学革命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历史大变革时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这些大变动，好像一次巨大的地壳运动，在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也发生了反响。史学家把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认为该时代的思想家具有“别开生面”的特色，不无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已进入其发展的后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内部也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及工农业内部结构中。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无疑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从而使明代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天工开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明代

科学巨匠李时珍（1518—1592）、徐光启（1562—1633）和宋应星等人，虽与欧洲同时的伽利略（G. Galilei 1564—1642）、维萨里乌斯（A. Vesalius 1514—1564）和阿格里柯拉（G. Agricola 1494—1555）等人相距遥远，然而中国科学界毕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全球性的科技复兴运动，并作出其力所能及的贡献。

明代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继承了前代的技术成果，又从国外引进并在国内推出不少新产品和新技术，在传统基础上有进一步充实、发展，生产技术水平全面提高。明代科学同样如此，由于西洋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使传统科学注入新鲜血液，技术科学也全面发展。这是在历史上集传统科技之大成的总结性阶段，但又充满着新时代的气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及《天工开物》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作者们具有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科学巨匠类似的气质，他们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有长途旅行的经历，在不同专业领域内放出异彩。他们对各种错误观念持批判态度，注重实践并基于自身观察、调查和试验从事写作，决不停留于书斋之中。同时他们又向科学界灌输了一些新的思想和精神。这些特点都可在《天工开物》中找到。与《崇祯历书》（1633）不同，《天工开物》是道地的中土产物，是反映明代社会和科技的一面镜子。此书主要根据作者在南北各地的实地调查而写出，就像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那样，因而具有直观的生动性和真实性的特点。

三百多年前一位曾五次追求进士功名的举人宋应星，为什么居然会写出这样一部书呢？很简单，他前半生在科举方面历尽坎坷，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读书人只埋头“四书五经”而缺乏实际知识，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养及织造，这才是儒者之耻。当他达到这一认识后，便毅然与科举决裂，转向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实学，向工农群众请教，及时记录下技术知识并加以提炼，从而完成这部杰作。《天工开物》是作者任江西省分宜县教谕（教官）时于崇祯九年（1636）写成的，当时他经济状况不佳，没有钱买参考书，没有地方接待同道讨论

学术，只在这小县城内简陋的房间里据调查资料、参以手边仅有图书而写作。成书后又无力出资刊刻，幸而老友涂绍焯（约1582—1645，字伯聚）^①伸出援助之手，使该书于次年（1637）出版于南昌府。这是该书的初刻本，简称涂本。我们这次译注、校勘《天工开物》，便以此本为底本。

涂本《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卷，各装一册，印以竹纸。全书有18章，经精确统计，共85,754字，插图123幅，上卷有六章，中卷七章，下卷五章。每章都从古代典籍中找出古雅的二字组成的词来命名。每章首都有“宋子曰”一段作为引言，对该章内容作提要性叙述，接下是正文，各章正文末尾附以有关插图。上卷分《乃粒》（谷物）、《乃服》（衣料）、《彰施》（染色）、《粹精》（米面）、《作咸》（食盐）、《甘嗜》（制糖）六章，中卷有《陶埏》（陶瓷）、《冶铸》（铸造）、《舟车》、《锤锻》（锻造）、《燔石》（非金属矿石烧炼）、《膏液》（油脂）及《杀青》（造纸）七章，下卷有《五金》（冶金）、《佳兵》（兵器）、《丹青》（朱墨）、《曲蘖》（酒曲）及《珠玉》五章，涉及工农业各生产领域，堪称技术百科全书。

此书从《乃粒》开始，而以《珠玉》殿后，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前者与民食有关，至为重要，故列于全书之首，后者无关国计民生，故置于书尾。作者解释说：“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这体现了他写此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六世纪中叶农学家贾思勰（493—550在世）在《齐民要术》（约538）中也有类似提法，可见这种优良传统由来已久。宋应星赞赏这种思想，还表现在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家食之问堂”上。“家食之问”典出《易经·大畜》，意思是研究在家自食其力的学问，而不以官禄为生，转义为研究实用技术。从书的内容来看，与食衣有关的章节描述得最为详细，篇幅占全

^① 关于涂绍焯事迹，参见拙著《明代科学家宋应星》，57—59页（科学出版社，1981）及《宋应星评传》，194—19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书一半有余，其次是金工、陶瓷、造纸、车船部分，而制曲、珠玉等均居末位，篇幅不大。按理说还应有一章讲漆器，也许作者因其不切民用，故略而不提。书中所述均以某种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为对象，如景德镇的白瓷、闽广蔗糖、嘉兴与湖州的养蚕、江西的水稻、淮安盐场的海盐、苏杭的丝织、福建的竹纸等等。作者必身临其境，否则无从写起，插图也非杜撰可成。宋应星放眼祖国大地，胸怀南北河山，对国民经济各领域都有所触及。从东北林区捕貂到两广南海采珠，从华东盐场晒盐到新疆和田采玉，广阔神州一幅幅壮观生产图景尽收书中。如此全面的技术著作，为中国有史以来至有明一代所仅见。现将其各章内容简介如下。

上卷：《乃粒》主要论述水稻、小麦的种植、栽培技术和各种农具、水利机械，旁及黍、稷、粟、菽（豆类）等谷物。对南方种水稻技术，介绍得特别详细。《乃服》文字最长，实际上占了两章的篇幅，分为养蚕技术及丝织技术，这是本章的核心，包括各种技术要点、工具、织机构造等。其次旁及棉纺、麻纺以及西北的毛纺。《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及染色技术，着重蓝的栽培、蓝淀的提取及从红花中提制染料的过程，此外涉及各种染料的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主要论及水稻、小麦的收割、脱粒及加工成米面的技术及工具，旁及其余杂粮的加工。《作咸》着重叙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制盐技术及工具，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则以福建、广东甘蔗种植、制糖技术及工具为重点，同时兼及蜂蜜及饴糖。

中卷：《陶埏》介绍砖、瓦及白瓷的烧炼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上釉到入窑都予以说明，尤详于景德镇烧造瓷器的技术。《冶铸》是中国古代技术书中有关铸造技术的最详细的记录，着重谈铸铁锅、铸钟及铸铜钱技术，包括失蜡铸造、实模铸造及无模铸造三种方法，所绘示的工艺图极为珍贵。《舟车》用技术数据记述各种船舶及车辆的结构及使用方法，船的部分详于内河运粮的漕船，而车则着重介绍北方的四轮大马车，旁及南北方的独轮车。

《锤锻》则系统叙述锻造铁器、铜器的工艺过程，从万斤的大铁锚到轻细的绣花针，还有各种金属加工工具如锉、锯、刨等都包括在内，对金属热处理及加工技术也作了介绍。《燔石》重点讨论烧制石灰、采煤和烧炼矾石、硫黄、砒石的技术，对煤炭分类、采掘、井下安全措施，都有可贵的记载。《膏液》则论述十六种油料植物子实的出油率，油的性状、用途，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旁及柏皮油制法及用柏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则叙述纸的种类、原料，尤详于论述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过程及设备，并提供了造纸技术操作图。

下卷：《五金》提供了关于金、银、铜、铁、锡、铅、锌等各种金属矿石的开采、洗选、冶炼、分离技术，还有各种金属合金的冶炼。这都是少有的可贵记载，生产工艺图尤其可贵。其中不少是中国人民的创造发明，如灌钢、以煤炼铁、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用大型活塞风箱鼓风，及分金炉、大型反射式炼炉等。《佳兵》先叙述冷武器，详于弓箭制造，简单介绍了弩机。其次是火药及火器，着重介绍提硝法、鸟铳、万人敌（地旋式炸弹）。其余火器仅有名目或简略提及，对火药配方及配制言之过简，火箭竟略而不及。火药及火器部分，此书不及其它明代兵书详尽。《丹青》主要叙述朱砂研制，从天然丹砂炼水银，再从水银与硫重新提炼为银朱的技术。制墨部分着重于松烟墨原料碳黑的烧炼，旁及油烟墨。《曲蘖》只介绍酒曲制造，不谈酿酒，作者认为“酒流（饮酒过度）生祸”，主要介绍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种类、配比、制造技术及用途，对红曲发酵过程中颜色变化有生动叙述。《珠玉》叙述珍珠、宝石及玉的开采，兼及玛瑙、水晶及琉璃。本章在解释珍宝玉器形成时间有误论，但所介绍的深水、深井操作技术则相当有趣。

作者本想还将其《观象》、《乐律》二卷附于书中，但临梓时又删去，料想是保持全书内容协调。按“贵五谷而贱金玉”思想安排有关章节顺序，这是可贵的。但从各章现有次序看，似乎未及考虑有关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从逻辑上讲，谈金属工

艺时，应先讲冶炼，接着是铸造、锻造，但事实上是铸造及锻造二章放在冶炼章之前，且二者中间插入不相干的《舟车》，另外金工三章分置于不同卷（册）内。其次，讲谷物种植后，应接着是谷物加工，而实际上这两章被衣料及染色二章隔断。油脂、制盐、制糖均与食有关，三章应紧密衔接，但却被锻造、烧石及造纸三章切断，显得不协调。铸造与锻造至少应先后相连，却反被“舟车”拦住。从业务性质来看，纸与墨总是不可分的，但偏被冶炼、武器二章分割。从全书体例看，有关衣食各章应同属一卷，其余手工业各章则按其内在关系依次置于以下二卷。事实则与此相反。

为什么会出上述问题？我们料想作者当初整理书稿、准备插图与交付出版，必是很匆忙的。因为他在1636—1637年间，同时应付六部书的出版，还有平时公务活动，来不及推敲《天工开物》各章顺序安排，甚至连文字润色也无暇顾及，他为此请读者原谅。但他始终未忘记将《乃粒》置于书首，而以《珠玉》殿后。其余各章如何安排则未及考虑。为使这部优秀作品体例、结构更加系统、严谨，我们在尊重作者主导思想、不改动文字前提下，对各章次序安排作了一些技术调整，并理顺其相互关系。作者有知，想也会同意。在对各章内容作系统研究后，我们按其内容相关性把十八章分为下列八组：

第一组：《乃粒》、《粹精》二章讲谷物种植与加工。第二组：《作咸》、《甘嗜》、《膏液》三章论盐、糖、油副食品。这两组均与民食有关，应置于全书之首。第三组：《乃服》、《彰施》二章论衣料及染色，与穿衣有关，也同样重要。以上三组应放在一册，构成上卷。第四组：《五金》、《冶铸》、《锤锻》三章同属金工，制品多为工农业生产工具及日用品，重要性仅次于前三组。第五组：《陶埏》、《燔石》二章讲陶瓷、煤炭、烧矿，与火工业务相近，故四、五两组应放在同册内，同属中卷。第六组：《杀青》与《丹青》二章论造纸、朱墨，与文化事业有关。第七组：《舟车》、《佳兵》讲车船及武器。第八组：《曲

《珠玉》二章与酒母及珠宝玉器有关，应置于全书之尾。六、七、八组可同列入下卷之中。因之我们对此书各卷、章作出下列组合调整：

天工开物序

卷上（七章）

- 一、乃粒；二、粹精；三、作咸；四、甘嗜；
五、膏液；六、乃服；七、彰施。

卷中（五章）

- 八、五金；九、冶铸；十、锤锻；十一、陶埏；
十二、燔石。

卷下（六章）

- 十三、杀青；十四、丹青；十五、舟车；
十六、佳兵；十七、曲蘖；十八、珠玉。

上述排列中，难以处理的是无法把包括黄金在内的《五金》放在下册，但原作者也没有将该章与《珠玉》紧放在一起。我们这次译注《天工开物》便采用这种新的卷次安排。原书卷名也有某种混乱。全书叫《天工开物卷》，每册又称上中下卷，每卷下又有《乃粒第一卷》等18卷，形成卷中有卷，“卷”字实在太多。此次依惯例将全书称《天工开物》，上、中、下三册称卷，但卷下称章，章下称节，节下称段。原《乃粒第一卷》今称《乃粒第一章》或简称《乃粒第一》。这样，全书卷、章、节、段、句都层次分明。又原书各节过细，未区分主次，如《乃服》有36节，实际上有的节只起段的作用。此次将有关节合并，原有一些节成了段，段首标黑体字以醒目。这样，结构就更紧凑了。原书插图前后位置也时有颠倒，此次理顺。我们对章节段及图都给以编号，便于检索。经过调整，该书体例大有改善。

本书写作蒙老一辈科学史家胡道静教授鼓励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关心，得以顺利问世。谨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书中疏误难免，敬请海内外读者不吝赐教。

二、《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的事迹

宋应星字长庚^①，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其故里在今奉新县宋埠乡的牌楼宋村，该村明代属北乡，实际上在县城东南方，东与新建县交界，有潦水流经于此。1963年笔者前往调查采访，全村一百多户，宋姓居三分之二，整个乡中宋姓也占多数，故称宋埠乡。这里是江南的稻米之乡，村的周围是整齐葱绿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房屋多具有古老建筑风格。村头有一座德水桥，是有数百年历史的石桥。村内有明代建立的石碑坊，故称为牌楼宋村。就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在当地已是家喻户晓，人人以此为荣。关于宋应星传记，已故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8—1936）在二十年代据江西地方志作了开创性研究。从那以后，人们对这位明代学者的事迹有了了解。长期内丁先生的作品成为唯一的参考文献。但六十年代初，我们南下调查时更发现了新的第一手材料，从而对宋应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材料包括他的胞兄宋应昇（1578—1646）在崇祯十年（1637）发表的《方玉堂全集》，和宋立权、宋育德在1934年刻印的《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新吴是奉新的古名，雅溪是潦水的古名。这是奉新宋氏家谱的第八次修订本。

根据《宋氏宗谱》卷一记载，宋应星家族祖先在元代（1260—1368）以前本姓熊。元、明之际，熊德甫就任南昌府丰城驿史，娶当地宋氏为妻，因避兵火，遂承妻姓而移居奉新雅溪一带。入明以来，宋德甫一家及其后人便世代定居于此务农，乘明初奖励垦荒之际，开发附近土地。在种稻之余，兼以养蚕为副业，家业有了好转。此后，宋家借雇工、佃田而成为经营地主，家产和人丁逐渐兴旺。宋德甫以下五代，都靠经营土地、农副业而发迹，至其第八代

^① 关于宋应星事迹，详见拙著《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及《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孙宋景（1476—1547）起，始由科第而进入仕途。宋景为宋迪嘉之子，宋应星的曾祖。据《明史》卷二十本传及其墓志铭所载，宋景字以贤，号南塘，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工部尚书、南吏部尚书，进北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卒赠吏部尚书、谥庄靖。他生前推行过内阁首辅张居正（1528—1582）的“一条鞭法”，还在南京督造过奉先殿，是朝廷中身居高位的阁臣。按封建社会惯例，宋景长辈、晚辈均受封荫，从此宋家成为官僚地主家庭，是奉新的名门望族。村中的“三代尚书第”石碑坊，就是为宋景、宋宇昂、宋迪嘉三代人而修建的。

宋景生五子，长子垂庆，次子介庆（1521—1590），三子承庆（1522—1548），四子和庆（1524—1611），幼子具庆幼年死去。宋承庆字道微，号思南，是宋应星的祖父，但年幼多病，二十七岁便早逝。宋和庆字瑞微，号塘季，1569年中进士，历任浙江安西州同知、广西柳州府通判，未几归里，刻《畅灵集》行世。和庆与承庆为同母韩夫人所生，是宋应星的叔祖。宋承庆虽博学能文，但为寿所限，未取得功名，卒后只留下孤子国霖（1549—1630），这就是宋应星的父亲。宋国霖字汝润，号巨川，他生下不久，其父承庆便去世了，由其年轻的母亲顾氏抚育。稍长后，顾氏将遗孤国霖托于叔父和庆教养。宋和庆既与承庆为同母所生，且辞官在家，家中又设有私塾，也乐于教育这个近房的侄子。但宋国霖少孤，且为独子，所以“少补诸生，在庠垂四十年”，没有外出，也无功名，充其量是个秀才。宋景四子中有二人中进士，且任地方官，如果宋承庆不是早逝的话，也必然会走这条路。这时宋家仍是繁华府第，家中佣人前呼后应，具有阁臣府第的气派。

宋景、宋承庆卒后，到宋国霖这一代时已家道中落，尽管仍拥有不少家产，但声名权势已非昔比。加上宋景四房中，惟有承庆这一房人丁不旺，宋国霖是孤子，娶妻后年30岁尚未生子，母顾氏只求延续后代，不希望儿远离家门，故国霖未曾科举入仕。宋国霖至31岁时，才得长子应昇，接着又有次子应鼎（1582—1629）、三子应星和幼子应晶（1590年生）。宋应鼎字次九，号铉玉，甘氏所

生，本县庠生，未出仕，享年四十八而卒。宋应晶字幼舍，王氏所生，副贡生，绝意科举，分家后迁居县城另过。宋应星四兄弟中只有应昇与他为同母魏氏（1555—1632）所生，而且这兄弟俩抱有科举入仕、为他们这一房出人头地的志愿，其余俩兄弟识字后便不离开乡土，均以布衣终，且都在中年逝世。明刊本《方玉堂全集》卷八记载，宋应星生母魏氏本农家女，万历丙子（1576）嫁到宋家，不到两年家中遇到大火，房屋及浮产均遭焚毁，家境渐以萧条。宋应星生于万历丁亥十五年（1587），小应昇9岁，是年其父国霖41岁、母魏氏33岁。应星降生后，家境更趋衰落，其母不得不亲操水浆为全家作饭。“饭尽，辄尝忍饥。蔬尽，不更为蔬”。可以说，他是出生在一个日益衰落的地主家庭。

在宋应星这个大家庭里，都不热衷于经营土地，没能再扩大家业，只就现有土地所得的收入，来维持全家生活和他们弟兄及孩子们读书。经过不断地消耗和家产的再分配，到宋应星这一代时家产逐渐缩小。当然这是与昔日宋家相对而言，并非一般农家可比。宋应星胞兄应昇，字元孔，自幼与弟同窗，形影不离，关系最为亲密。万历乙卯（1615），兄弟同中举人，后五次北上会试落第。崇祯四年（1631），宋应昇任浙江桐乡县令，母丧时归里，再转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1635—1637），升高凉府同知，崇祯十五年迁广州府知府。甲申（1644）明亡后辞官归里，因忧心国事致疾，清初顺治二年（1646）服毒而死。宋应昇是诗人，著《方玉堂全集》（1638），又撰《宋氏宗谱》（1637）。后来，其曾孙宋瑾（1718—1794在世）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行《方玉堂全集》第二版，1772年清廷设四库馆时，此书因有反清内容被列为禁书，但至今仍有传本。而《宋氏宗谱》为第三次修订本、第一次刊本，今不可得。

关于宋应星早期活动，宋应昇和族侄宋士元（1649—1716）都有记载。起初，宋应昇、应星在家乡受叔祖和庆的启蒙教育，后就学于族叔宋国祚。再以后，兄弟二人拜新建的学者邓良知（1558—约1635）及南昌的学者舒曰敬（1558—1636）为师。邓、舒二位都

是进士出身，任过知县以上官职的“功成名遂”的人物，又都在任期不满明末腐败政治、忤怒权奸而被逐出官场。他们像东林党人那样，辞官后以书院为讲坛，教授生徒，宣扬其政治主张。在舒曰敬周围出现了不少江西的著名人物，如涂绍燿、诗人万时华（1590—1640）、文人徐世溥（1607—1657）、诗人廖邦英（1558—1642）等人。宋应星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过人，识字后不及十岁便会作诗，后又致力于“十三经传”、宋代理学、历史以至诸子百家书。他的兴趣很广，对音乐、诗、天文、医药、奕棋、绘画以及质测之学（自然科学）都十分爱好。他还从邓良知、舒曰敬那里受到一些与东林党、复社党人相近的思想影响。在他18岁那年（1604），因弟兄四人均已成年并完婚，因而分家，开始独立生活。

分家后，宋应星仍常与兄应昇在一起活动，他们想走曾祖宋景的路子，通过科举而金榜题名，以重振门风。他青年时代主要时间及精力都用在应试上面。万历四十三年（1615），二人去南昌同中举人，29岁的宋应星名列第三，应昇名列第六。这一年江西全省考生有一万多人，中举者只109人。奉新考生中只有宋应星弟兄及第，且名列前茅，故时人称“奉新二宋”。他们因此受到鼓舞，决定趁这个势头更上一层楼。同年秋，他们二人离开江西北上，以应丙辰年（1616）在北京举行的会试。这是封建时代三级考试中最高一级，考中者成为进士。二人水陆兼程，跋涉万里来到北京赴考，但与乡试结果相反，二人落第而归。初次会试失败，没有使他们失去希望，决定下次再试。他们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启三年（1623）、七年（1627）及崇祯四年（1631）先后五次北上会试，结果均名落孙山。最后一次应试时，宋应星已45岁，应昇已54岁，双鬓见霜了。

尽管宋应昇、应星有“六上公车不知苦”的韧劲，但五次会试已必元气大伤，此后便没有再试。他们每次从南到北的沿途都看到阉党巨奸魏忠贤（1568—1627）专政时官场的各种腐败现象，到处是贪风污雨、任人唯亲，官吏鱼肉人民，政情黑暗，使他们原来的幻想化为泡影，从此对科举完全绝望。1632年，宋应星丧母，他们

按当时习俗要在家守孝，也无法再出远门。加以五次万里征程破费不少钱财，娶妻生子要加以抚育，宋应星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考试。1634年他出任本省袁州府分宜县教谕。这是个未入流的九品以下的文职下级官员，主要教诲在县学里就读的生员，先后在这里任职四年（1634—1638）。而其兄也赴浙江桐乡任县令去了。桐乡离全国著名养蚕、丝织中心嘉兴、湖州很近，宋应星在探望哥哥时，必定去嘉兴、湖州作过调查访问，这使他在《天工开物》中对这一带蚕丝业技术给以特别注意。

1616—1631年间应试时的多次万里远游，虽未达到宋应星科举及第的目标，但对他来说也并非空举。正好实现他在《天工开物》序中所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的大好时机。这些长途旅行打开了他的眼界，扩充了社会见闻，足迹遍及京师、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的许多城市和乡村。他还到过广东，也许还去过四川和山西。沿途他在田间、作坊从劳动群众那里调查到不少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知识、操作过程，并对操作实态作了素描，写下不少笔记。这就为日后写作《天工开物》作了准备。自从他对科举绝望以后，便决心转向实学，研究与国计民生直接关联的科学技术问题。这时他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完成了他一生中的重大的转折。教谕任期内，有更多的闲散时间，他便抓紧时机整理资料，从事写作。除科技问题外，他还写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作品，同时整理自己多年来写作的诗。四年之间他成了一位高产的作者，著作一部接着一部地问世。

崇祯九年（1636），50岁的宋应星在一年内便刊出《画音归正》（论音韵的书）、《原耗》（政治、经济杂文）、《野议》（政论集）、《思怜诗》（自选诗集）等书。第二年（1637）他发表了一生中的代表作《天工开物》，还有《卮言十种》（杂著十种）。在写作这些书时，明末社会动荡不安，清兵南下直接威胁着京师的安全，而李自成（1606—1645）领导的农民军正在各地迅速发展，又从内部打击明王朝的统治，使其危在旦夕。同时，正好这